



财政分权、财政政策 与需求结构失衡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scal Policies and
Demand Structure Unbalance

李永友 著



财政分权、财政政策 与需求结构失衡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scal Policies and
Demand Structure Unbalance



李永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政分权、财政政策与需求结构失衡/李永友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0-15564-7

I. ①财… II. ①李… III. ①财政分散制-研究-中国②财政政策-研究-中国③需求结构-结构失衡-研究-中国 IV. ①F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5469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财政分权、财政政策与需求结构失衡

李永友 著

Caizheng Fenquan Caizheng Zhengce yu Xuqiu Jiegou Shih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印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4.2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9 00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自 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需求结构失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为了摆脱结构失衡困扰，实现经济平衡稳定增长，政府采取了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宏观调控策略。10 多年时间过去了，回过头对宏观调控成效作出理性评估，可以概括为增长效果显著，结构失衡严重。因为 1999—2010 年，虽然经历了两次危机，但经济依然保持年均近 10% 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中其他三国同期水平，所以就增长目标而言，不能不说效果显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支撑。然而基于需求管理的调控策略成本也是巨大的。首先，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改观，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依然非常严重，在 1999—2010 年期间，居民消费率不仅没有企稳回升，反而呈持续下降态势，12 年下降超过 11 个百分点。其次，因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政府支出和投资需求，这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现有制度框架下，使粗放式增长的微观激励结构进一步强化。再次，以扩大支出为主的财政调控策略带有明显的集权色彩，为了提高调控能力，资源纵向集中日趋明显，这不仅使政府内部、公众与政府之间张力不断扩大，而且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造成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最后，基于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策略使经济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弱化，造成经济系统对宏观调控的过度依赖。宏观调控成本收益的上述分析表明，如果不考虑宏观调控的政治因素，仅从经济学意义上，基于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策略如不适时转换，我们很难想象结构失衡问题会在“十二五”期间得到缓解。不仅如此，伴随着系统内部张力的不断扩大，经济很可能因外生冲击走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矛盾将会因经济问题迅速积聚并链式爆发。

以扩大支出为主的需求管理缺乏适用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自 1998 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策略基本上依据的

是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但我们在借用该理论时忽视了该理论的适用条件。首先,需求管理针对的是经济的短期表现。换句话说,经济短期内会偏离均衡增长路径,同时理性思维会使整个经济陷入协调失灵,从而造成经济难以在短期内走出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用需求管理可以重振市场信心。但在我国,需求不足并不是因外生冲击造成的短期现象。由于市场结构不同,我国与成熟市场经济的内部需求结构有很大差异,我国遭遇的需求冲击主要源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以需求的短期不足最多也只能说是外需的急剧下降,而非需求的全面不足。在我国,经济系统的投资需求因投资冲动一直非常旺盛,年均 38% 的投资率足以证明这一点。相对于投资需求,居民消费需求的确相对不足,但居民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并不是一个短期表现,而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一方面源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体系,另一方面源于我国转型过程中的大规模制度变迁给公众造成的不稳定心理预期。前者表现为想消费却没钱消费,后者表现为有钱消费但不愿消费。其次,需求管理之所以能使经济回复均衡增长路径,一个很重要的假定就是乘数效应,而乘数效应又根源于政府所能激发的公众消费意愿。但在我国,由于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流转税,所以公众消费意愿对减税并不敏感,而长期的社会性政策缺失又使得财政支出对公众消费意愿的刺激效果难以显现。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管理只能依赖于政府需求替代居民需求、投资需求替代消费需求。这种需求管理的调控策略虽能收到短期效果,但成本非常巨大,并使经济系统的内在调节功能更加弱化。因为上述替代方式虽然减弱了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短板效应,却对居民消费形成更强挤压,造成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相应的消费意愿支撑,我国的需求管理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整个经济系统对需求管理形成了严重依赖,经济运行呈现出明显的调控周期特征。

以扩大支出为主的需求管理因体制约束而难以为继

经济系统的轴心实际上是经济主体,即使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中也不例外。所有的经济现象都是源于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及其相应的资源配置结果,而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又源于经济系统中内含的一系列激励结构和约束条件。这意味着,宏观调控尽管可以外生嵌入,但需要立足于经济系统的微观基础。在我国,分权型经济、关系型社会和集权型政治的三位一体结构构成了所有经济社会活动的治理框架,所有决策都内生于这个体制。在集权型政治结构下,所有调控决策都是中央政府作出,

并在垂直的委托代理模式下被纵向贯彻执行，而分权型经济治理又赋予地方政府在执行调控政策时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出于竞争需要，地方政府总是在上级政府需要和地方利益的权衡中选择性执行中央的调控政策，不仅如此，作为地方社会经济事务的总承包人，地方政府在现行的财政制度下与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形成隐形战略联盟，同时在关系型社会治理模式下出于自身需要配置财政资源，甚至整个社会资源。在上述体制环境下，需求管理较供给管理在我国总是更受青睐，因为需求管理在现行体制下与任期制非常切合。

但由于缺乏充分的微观基础，需求管理不仅被选择性实施，而且被不断强化。首先，在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社会性政策长期短缺的情况下，需求管理总是选择投资需求和政府支出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主要途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机制，投资需求又只能选择政府和国有企业作为主体，而这种形式的投资需求效率必然是低的。为了能够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使用效益，政府不是在投资效率上下工夫，而是根据增长需要选择性使用政府控制的资源，这一点在许多学者有关政府财政支出偏向的研究中得到充分佐证。政府资源的选择性使用不仅使财政分配丧失了应有的正义性，对社会道义形成了较大负外部性，而且扩大了社会裂痕，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程度。尽管自 2002 年之后，在社会冲突的倒逼下，需求管理实行了某种策略性调整，但因缺乏必要的激励结构作基础，政府的真实意愿并没有被社会所接纳。其次，需求管理在分权型经济治理结构下激发了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这种投资冲动不仅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内在冲突加剧，而且使财政背负了巨大风险。在集权型政治体制框架内，由于任期制的内在约束，各级政府都有着巨大的投资冲动；由于政府可控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同级政府以及上下级政府之间形成了不同于西方联邦制下的政府间竞争。为了满足本地企业的竞争需要，下级政府总是选择性执行上级政府的调控政策，而上级政府总是选择集权式治理方式对下级政府实施纵向控制。从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看，零和博弈式竞争关系相当普遍。虽然地区间也有合作共赢式竞争，但非常零星。由于资源被向上集中，所以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下级政府只能选择非财政手段筹集建设资金，并使竞争自上而下逐级增强。政府间上述竞争结果使得原本粗放式发展方式不仅难以转型，而且在经济低迷时期使发展方式转型容易中途夭折，重新走上粗放式发展之路。

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的困境

需求管理是一项短期调控策略，不可能作为一项长期策略被使用。而我国经济的短期表现虽然总是源于外生冲击，却内生于经济系统的长期结构失衡。所以我国经济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说成是一个长期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通过应用需求管理予以解决。从根本上消除结构问题，不仅需要短期的需求管理，更需要长期的供给管理，尤其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供给管理较需求管理更为重要。但我国现在应用供给管理还缺乏必要基础。从成熟市场经济体经验看，实施供给管理，首先需要相应财政制度，即财政收入制度以直接税为主，尤其是个人缴付部分，财政支出直接针对个人和家庭，前者筹集资金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超过 80%，用于个人或家庭的开支占全部财政支出比重同样超过 80%。而在我国，财政收入主要通过间接税筹集，直接税所占比重不到 30%，财政支出主要以维持性和经济性项目为主，两者占比超过了 50%。在这样的财政制度下，个人和家庭对财政调控的敏感性较低，所以供给管理的短期效应不会很明显。其次，实施供给管理缺乏必要的激励。在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约束很弱，政府财政活动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对上级政府而言，可以根据需要实施纵向资源集中；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滥用行政权控制社会资源，所以实施支出扩张政策非常容易。财政的软约束为需求管理提供了激励，并使需求管理陷入了累积循环状态，即支出扩张需要税收支撑，税收超长增加使市场主体可支配收入下降和投资消费能力与意愿降低，这又使政府不得不更加依赖支出扩张。

当然，上述并不是供给管理在我国受阻的全部原因。但尽管如此，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是一种必然选择，只是在具体策略上可能需要考虑现行体制、制度等约束。总之，策略转换必然伴随着利益结构的调整，所以需要改革者的魄力和勇气，尤其在我国，有赖于决策者的主观意愿和执行者的主观自觉。

内容摘要

本研究主要从财政角度分析需求结构失衡，尤其是其中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主要源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内外经济双重失衡的根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不解决，中国内外失衡问题不可能有效解决。虽然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扩大内需，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就一直是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主要抓手，但收效甚微，因为在经验上，居民消费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到 2010 年已下降至 37% 以下，这远远低于 50% 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为什么宏观调控未能稳定并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本研究试图从财政分权、财政政策等财政角度对上述两个问题展开分析。应该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已有文献讨论的收入分配差距、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二元治理等，但从财政角度研究的文献却很少。而实际上，在中国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挤压主要源于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因为在现行的分权体制和制度结构下，政府与企业更容易形成隐形战略联盟，从而形成不利于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政府出于竞争压力和增长目的，更倾向于采取有偏的财政政策治理经济，而这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有一定作用，但从长期看，由于受工具性约束和制度性约束，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所以不仅未能稳定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反而使居民消费意愿进一步下降。

整个研究包含八个部分，这八个部分既相互独立，又有一定关联性，从不同角度分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财政原因。

第一部分对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与否及其失衡程度作出判断，在钱纳里和赛奎因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造需求结构变化与收入转换、市场规模和结构特征的关系等式，探究需求结构，主要是居民消费率变化的一般模式及其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数据模拟结果对我国需求结

构变化是否偏离其变化的一般模式作出判断。

第二部分给出从财政角度研究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分析框架。首先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分权制度设计与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选择对中国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揭示前者引起后者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进而对需求结构失衡的风险传递效应进行实证描述。接着对需求结构失衡中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可能的财政解决办法进行分析,构筑居民能消费、敢消费的财政体制与政策环境。最后对体制调整和政策选择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第三至第五部分主要从财政分权角度考察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财政体制因素。其中,第三部分主要从体制演进视角研究财政分权策略与政府财政支出意愿的关系,重点解释公共品供给不足产生的原因。第四部分主要从地区间竞争视角研究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策略选择,重点解释竞争压力与政府财政收支决策的内在逻辑关系。第五部分主要从激励结构视角研究分权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制度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行为的关系,重点解释分权制度安排对公共品提供主体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影响。这三部分主要是对第二部分分权体制及其制度安排对需求结构主要是其中的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的深化。分析遵循的逻辑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源于公共品供给短缺,而公共品供给短缺又源于财政分权策略及其分权制度安排。

第六至第八部分主要从财政政策角度考察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财政政策因素。其中,第六部分主要研究消费者信心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重点解释消费者信心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性。第七部分主要研究消费者信心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重点解释消费者信心在财政政策调控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消费者信心非对称变化的财政政策因素。第八部分主要研究消费者消费意愿与财政政策关系,重点解释消费者消费意愿趋势变化特征及其财政原因。这三部分主要针对第二部分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选择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的深化。分析遵循的逻辑是:居民消费需求高低是否除了受收入约束外还受信心约束?消费者信心与财政政策之间存在怎样的双向作用关系?消费者信心下降直接表现为消费者消费意愿的下降,在消费意愿下降过程中,财政政策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通过研究,获得了如下结论:

- 在经验上,我国需求结构自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 年就开始进入失

衡状态,其中水平偏低和下降速度过快是其主要特征。尽管失衡一直存在,但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如果考虑水平偏低的历史因素,需求结构失衡程度依然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当前需求结构失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高增长的必然结果。

- 我国分权体制下的财政制度安排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重要财政原因。重新平衡需求结构,需要在现行体制框架内重构财政支出体系,构筑居民有钱消费、敢于消费的制度环境,同时确立以直接税为主的财政收入制度,构筑政府有效行政的激励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内生平衡机制。

- 以中央政府为主导、财权划分为核心的财政分权策略是中国公共品供给相对短缺的根源。提高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和政府公共品提供意愿,需要重塑财政体制的激励结构,从财权意识转向公共责任意识,而不是仅仅解决财政体制存在的收支不匹配问题。

-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国地区间竞争正在由单纯的粗放式税价竞争转向财政支出竞争,财政支出竞争的结果是社会事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以及社会性支出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事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社会性支出增长滞后,直接导致公共品供给相对不足。

- 分权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对地方财政收支决策构成了不恰当激励,造成地方政府严重的预算软约束和有偏的支出倾向。转移支付下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行为变异,直接导致转移支付资金难以充分转化为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

- 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导致的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使低收入群体难以充分参与经济增长成果分享,而且恶化了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预期,成为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财政根源。

- 积极财政政策对恢复消费者信心作用显著,但作用效果在不同政策工具之间差异明显。扩张偏向的财政支出政策虽在萧条时期对消费者信心有显著促进效果,但主要是通过增加社会性支出实现的;而快速膨胀的行政管理费却恶化了消费者信心,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 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主要源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与财政政策调控策略密切相关。中国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内需扩张政策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呈显著非凯恩斯效应。虽然财政收入政策的作用效果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在过去10多年中,我国财政收入政策总体上却是紧缩的。

目 录

第 1 章 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经验判断	1
一、基本事实	1
二、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了吗？基于已有文献的综合分析	2
三、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跨国经验	6
四、我国需求结构失衡测度：基于统计分析的结果	12
五、本章小结	15
第 2 章 需求结构失衡的财政因素：一个分析框架	17
一、导出问题	17
二、需求结构失衡：由投资型增长模式而起	18
三、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短缺与居民消费需求抑制	22
四、财政制度安排与需求结构失衡的强化机制	24
五、财政政策失衡与需求结构失衡的循环累积	28
六、需求结构失衡的风险传递效应	31
七、构筑有利于需求结构再平衡的财政收支体系	37
八、本章小结	41
第 3 章 财政分权策略与公共品供给短缺	43
一、导出问题	43
二、多变的财政体制与财政社会性职能的履约机制	46
三、“分灶吃饭”体制与有偏的激励结构	51
四、“分税制”下的政府行为及其财政支出意愿	59
五、公共品供给短缺引致的公共风险	68
六、政府应对公共品短缺的财政政策	73
七、本章小结	77
第 4 章 分权体制、竞争压力与地方财政收支策略	80
一、典型事实	80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命题	83
三、估计模型的设定	89
四、数据说明和估计结果	91
五、本章小结	97
第 5 章 转移支付制度与地方财政收支策略	99
一、问题导出	99
二、转移支付制度的激励效应：基于文献的归纳	101
三、理论模型	103
四、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变量选择	106
五、变量定义、数据说明与估计结果	110
六、本章小结	123
第 6 章 消费者信心、消费需求与财政政策	124
一、问题导出	124
二、相关文献与理论基础	126
三、消费者信心对消费需求变化的解释力	129
四、财政政策能够提振市场信心吗？	133
五、本章小结	142
第 7 章 市场主体信心与财政政策效应的交互作用	144
一、一些典型化事实	144
二、理论模型	149
三、实证策略	153
四、数据说明与实证结果	158
五、进一步分析	162
六、本章小结	167
第 8 章 居民消费意愿下降与财政政策效应	170
一、问题导出	170
二、关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些讨论	171
三、居民消费率结构分解及其持续下降之谜	175
四、城乡居民消费意愿估计及其趋势特征	179
五、居民消费意愿趋势变化的财政政策因素	187
六、本章小结	199
参考文献	201

第 1 章 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经验判断

本章提要：探寻是否存在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并依据这一模式对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与否作出判断。本章在钱纳里和赛奎因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跨国数据的比较和计量分析，试图探究这种一般模式的主要特征。研究表明，需求结构变化虽然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的一般变化模式，但从需求结构变化中的收入效应、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看，依然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依据这些规律，我们构造了居民消费率变化与三类效应之间的关系等式。根据这一等式模拟的居民消费率变化趋势对我国需求结构失衡情况进行了评估。结论表明，尽管我国需求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但失衡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 20 年，近年来，这种失衡程度有所减弱。研究还表明，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是经济高增长的必然结果。

一、基本事实

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这一问题就被提出来，并被社会广泛关注。需求结构失衡问题一经提出，就形成社会普遍共识。一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投资需求非常强烈，但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相对较弱。其主要表现就是投资需求占社会总需求比重逐年增加，2010 年全社会投资率超过了 45%；相反，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开始呈总体下降趋势，2010 年居民消费率已下降到 35% 以下。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通过跨国数据比较，为上述需求结构失衡推断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经验证据。也有学者根据社会最优积累率理论对我国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的适度水平作出估算，

结论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前述经验推断。然而,就在社会普遍认为我国存在严重需求结构失衡问题的同时,也有少数学者提出不同看法^①,这部分学者认为,如果我国长时间存在严重需求结构失衡,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过去 30 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至少说明,我国即使存在需求结构失衡,也不会像统计数据反映的那么严重。虽然上述判断并没有充分证据支持,但这部分声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需求结构失衡的判断依据,这个依据要能反映需求结构变化遵循的一般规律。本章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已有文献基础上,从跨国证据中总结出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并依据这一规律对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与否作出判断。

二、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了吗? 基于已有文献的综合分析

从逻辑上说,判断需求结构是否失衡至少需要一个依据或者说至少有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标准,这个依据或标准给出了最优需求结构的基本特征。所以探究这个依据或标准自然成为判断我国需求结构是否失衡的逻辑起点。那么这个依据或标准是什么呢? 已有文献主要从两个角度给出答案,一部分文献通过数据的跨国比较建立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另一部分文献则依据黄金率资本存量建立社会最优积累率,然后在一系列假定下反推社会最优消费率,从而建立社会最优需求结构。

在探究需求结构变化一般规律的文献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来自库兹涅茨(1957)和钱纳里、赛奎因(1975),虽然这两项研究不是专门讨论需求结构问题,但在归纳不同总量指标的收入转换效应时提出了消费需求和资本积累、国民储蓄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数量关系。其中,库兹涅茨(1957)在《各国经济增长的数量方面》一书中,继承了克拉克有关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成果,通过 20 多个国家数据的对比分析,归纳出伴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发生增长结构形态变化的一般规律。

^① 张军(2010)认为,假如世界消费占比的平均值是 70%,中国可以如此大幅度偏离这个均值而经济居然不出问题吗? 王庆(2009)同样认为我国投资过热和消费不足被夸大了。参见张军:《为什么消费不足可能是个伪命题》,载《经济观察报》,2010-01-29;王庆:《中国消费不足、投资过热现象被夸大》,载《华尔街日报》,2009-12-03。

然而,由于受到数据限制,库兹涅茨对各国经济结构定量分析采用的主要是横截面数据。正是由于这种数据限制,库兹涅茨的研究在应用于各国整个时期内经济结构变化分析时受到了很大约束。基于库兹涅茨研究,钱纳里和赛奎因(1975)作了进一步深化。在《发展的格局》一书中,两人不仅将样本数量扩展到101个国家,而且将研究时段扩展到21年,讨论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间,社会资源配置在收入转换过程中的变化特征。和库兹涅茨研究方法不同,后者不仅使用了比较分析方法,而且采用了计量方法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收入效应和规模效应进行计量。根据人口规模,研究对大国和小国作了明确区分,给出了大国和小国投资率、私人消费率、储蓄率等结构指标在不同收入下的大致水平和一般趋势。根据钱纳里和赛奎因(1975)的研究,有两个结论对今天考察我国需求结构变化具有启发意义。一是资源配置在1950—1970年的总体变化规律,其中私人部门消费率呈整体下降趋势。二是社会资源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最优配置随收入变化而有所不同。

参照上述两项研究,一些文献通过跨国数据的对比分析对我国需求结构,主要是消费率的合理性作出判断。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2004)通过与世界平均水平、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发展阶段相近国家、发达国家历史数据等的比较,指出我国消费率不仅在绝对水平上较低,在相对水平上也处于同一类国家的最低水平。王子先(2006)通过与国际平均水平的对比,认为我国消费率居于世界较低水平,明显偏离世界消费变化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蔡跃洲、王玉霞(2009)在分析消费结构影响因素时,通过跨国数据的统计分析得我国合意投资率和消费率区间,并将这一区间与现实数据比较,认为我国投资消费结构明显失衡。晃钢令、王丽娟(2009)则完全基于钱纳里和赛奎因(1975)的研究,但针对其中的人口规模、人均收入和资源流入三项指标,结合我国实际作了相应调整,研究认为,我国消费率基本处于钱纳里和赛奎因模型可以解释的范围。类似研究还包括 Willem Buiter 和 Minggao Shen (2010)等。除了通过跨国比较获得需求结构失衡与否的判断依据,一些学者还通过不同发展模式下需求结构应该具有的特征分析,研究我国消费投资结构。例如李建伟(2003)通过对工业化进程关键特征的分析指出,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产业结构提升,投资率会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结束,投资率、消费率会逐步趋于稳定。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投资率、

消费率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是一个自然演化过程。曾铮（2011）在比较典型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时也指出，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相应的经济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和发展特征会存在明显区别。我国现阶段投资消费结构基本与其提到的四类经济发展模式相吻合。

根据上述文献，关于我国投资消费结构是否失衡，结论是模糊的。实际上，一个经济体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与这个经济体内在结构特征有很大关系。同处一个发展阶段的两个经济体，可能因为其内部结构差异，投资率和消费率就可能不同。所以，从理论上说，需求结构具有明显国别特征和阶段特征。正是由于需求结构的这一特性，一些学者对跨国比较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例如刘立峰（2004）认为通过国际比较很难为消费率定一个合理标准，合理的消费投资关系必须视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情而定。许永兵、南振兴（2005）也指出，仅靠简单的国际对比就认定我国消费率严重偏低有误导之嫌。郭兴方（2007）同样对通过跨国比较建立全球统一的消费率标准提出疑义，他认为，翻阅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卷，很难为消费率找到一个统一合理的标准。然而，尽管跨国比较的经验标准可能存在问题，但不失为一种方法和尝试。问题的关键是，在进行跨国分析时，需要更加细致，尽可能考虑不同国家内部的结构特征。

跨国经验除了存在上述局限外，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跨国经验只是通过数据比较和一般统计分析，得出的消费投资结构只是反映需求结构和各种经济总量间的某种数量关系。这种关系只能反映数据变化的某种共同趋势，并不表示一种社会最优结构。跨国经验的这一内在不足促使人们探寻社会最优需求结构。实际上，对于是否存在某种最优投资率和消费率，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议。不过这并没有阻碍人们试图建立某种社会最优标准的努力。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在拉姆齐（1927）研究基础上就开始探究最优社会积累率。例如1961年经济学家费尔普斯根据索洛增长模型提出了著名的黄金律法则。根据该法则，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如果资本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人口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时，该经济体的资本存量就处于最优水平。黄金律法则意味着，在假定储蓄能够转换为投资的情况下，社会最优资本存量水平一旦确定，社会最优储蓄率和消费率也就相应被确定。尽管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在费尔普斯（1961）基础上，对黄金律法则作了不同修正，但这一法则确定的基本数量关系依然成为判断经济动态效率的关键依据。根据

费尔普斯(1961)的黄金律规则,1989年,Abel等将不确定性引入代际交叠模型,提出了一个更简便的经济最优资本积累率判断标准,即资本净收益大于总投资的AMSZ准则。

AMSZ准则的提出不仅拓宽了黄金律法则的应用,而且使研究结论更加精确。后续有关经济动态效率和最优资源配置结构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应用这一准则。自21世纪初,AMSZ准则也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经济动态效率的判断。例如Leonard和Prinzinger(2001)通过使用AMSZ准则,计算出1980—1996年间我国净现金流为负。史永东、杜两省(2001)在讨论资产定价泡沫对经济的影响时,也曾利用AMSZ准则判断过我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利用这一准则的文献还包括史永东、齐鹰飞(2002),袁志刚、何樟勇(2003),刘宪(2004),王晓芳、王维华(2007),项本武(2008),吕冰洋(2008),黄飞鸣(2010)等。然而上述研究在讨论经济动态效率时并没有给出我国经济需求结构失衡与否的直接判断依据,虽然这些文献关于资本积累是否过度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暗含了消费率合理与否的判断,但对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我国,这种推论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为了借助黄金律法则,一些学者在最优积累率基础上继续分析最优消费率应满足的条件。例如孙烽、寿伟光(2001)借助拉姆齐模型和数值模拟方法,对我国最优消费路径进行了估算。顾六宝、肖红叶(2005)基于消费者跨期选择推导出最优消费路径的条件等式,并通过数值模拟测算出我国最优消费率的大致范围。谭小芳等(2006)同样在最优增长框架下讨论了投资和消费的合理结构。吴忠群、张群群(2011)综合费尔普斯等人关于黄金律法则的论述,建立了最优消费率应满足的条件,并给出我国最优消费率的估算水平。

相比较跨国经验,基于黄金律法则的最优结构分析更具经济合理性,但问题同样非常严重。一是依据黄金律法则推导社会最优资本配置结构需要一系列严格假定,这些假定在现实中是否得到满足需要值得怀疑。二是依据AMSZ法则建立最优资本积累率判断如何克服市场缺陷产生的影响。即使不考虑上述两个方面问题,还有一点同样令人怀疑这种方法的可靠性,就是利用这一方法估算的我国最优消费率,不同文献存在很大差异。两种方法的比较结果表明,两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所以很难说一种方法较另一种方法为优。除了上述两种方法,近年来,一些文献试图根据我国经济结构特征建立最优需求结构判断标准。例如贺铿